

评 《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

黎 虎

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大抵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对本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提出的所有创新见解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经过实证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论证方法之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并升华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梁满仓先生《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考论》）就是这样一部学术著作。

—

《考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魏晋南北朝的礼制问题。回顾学界对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具体制度尤其是婚礼、丧礼成果甚多，整体礼制则少有论及。较早涉及这个时期礼制且有影响者当属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但其重点在考察南北朝与隋唐礼制的渊源关系，并非对魏晋南北朝礼制本身的研究。近年来礼仪制度研究兴起热潮，一些论著开始接触到魏晋南北朝礼制问题，但或者是描述式的论说，缺乏高度和深度；或者失之简略，使人难得其详。《考论》一书正是弥补了上述缺憾，从整体上对魏晋南北朝礼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考论》指出，魏晋南北朝所实行的礼制是逐步形成的五礼制度，全书围绕这一核心命题从各个角度展开充分的研究论证。这个研究论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二两章分别探讨了五礼制度发生发展的思想认识背景和文化学术背景，可以说是时代背景层次。第三章探讨了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形成过程层次。第四、五、六、七、八章分别探讨了吉、嘉、军、宾、凶五礼本身的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实践层次。三个层次的探讨，不仅说明了五礼在魏晋南北朝的制度化乃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清晰地描述了五礼制度孕育、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不仅考证了五礼制度的具体内容，也论证了五礼制度对国家政权的建设作用，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使魏晋南北朝所实行的礼制为五礼制度这一命题得到充分的论述，成为魏晋南北朝礼仪制度研究中的不刊之论。

这个命题的论证对推动魏晋南北朝的礼制研究乃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宋代以来，学者多把秦汉以来的礼仪制度看作只是用于郊庙朝廷的虚空之

文。直至清代乾嘉及以后的学者，也是从经学角度考证礼制条文，很难反映出礼制的全貌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陈寅恪先生敏锐地察觉到礼制与士大夫阶级的密切关系，提出治史者不应以礼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页）。比起清代学者，陈先生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仍没有否认礼仪制度多为空名。后来学者的研究，大体上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乾嘉学者从经学角度考证礼制条文的藩篱。《考论》一书没有走前人的老路，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个时期的五礼制度展开研究。这种研究把礼仪制度放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使之不再是虚空的条文，从而揭示了礼仪制度背后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融合、道德思想、社会风貌等社会现象。这种揭示在书中几乎所有章节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在论述人们对礼的治国作用认识的强化时，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发展方面，是在不断的反复曲折中一步步趋向统一和稳定的时代；在政治实践方面，是具有深厚儒学素养的政治家们充分发挥治国才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代；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以儒学思想为主体各种学说和社会思潮不断碰撞和融合的时代。这种时代特点，决定了当时人们在谋求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时的实践方式，即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使之在政治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实践方式，又决定了礼对治理国家的作用不断被强化的发展走向。”（第56—57页）作者从政治实践、社会发展、文化特点等方面说明对礼的治国作用认识的强化，从而说明在这个时期出现五礼制度是有其深刻的时代条件和思想认识基础的。这种论述在具体的礼仪制度的研究中也处处可见。例如在嘉礼一章中对“尊老养老”礼的社会作用的研究中，作者写道：“尊老养老是嘉礼制度中的一个内容，在五礼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五礼制度既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反过来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尊老养老制度而言，其对当时的社会建设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尊老养老是促进社会道德建设的有力杠杆。”（第375页）这种道德体现为报本反始“孝”的精神（第376页）、敬长尊老“礼”的精神（第377页）、广泛爱老“仁”的精神（第378页）、舍身护老“义”的精神（第379页）。第二，尊老养老促进社会的政通人和（第380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老人们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朝廷的老年官员用他们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为当权者提供咨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决策的正确性。地方上的乡邑耆老帮助地方政权教化百姓，处理行政事务，解决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评价地方官员政绩优劣的声音，对政治上扬清抑浊发挥着舆论导向的作用。”（第384页）

从历史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的礼制是古代礼制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其难点在于研究者不仅要有经学知识的积累，也要熟悉这个时期的历史，并对其有深厚的功力。前人从经学角度研究礼制成果颇丰，从历史角度研究礼制成果较少，因此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惟其如此，《考论》对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的研究，具有诸多创新意义，从而填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研究的发展。不仅如此，“五礼”制度的形成和发

展,从隋唐以后“五礼”作为国家重要制度,在杜佑的《通典·礼典》中被固定下来,以后各代礼制虽各具时代特点,但其核心大体上仍为“五礼”的内容和实践,这充分显示了《考论》在深入系统研究礼制发展史上具有首创意义。

二

《考论》有系统的章、节、目,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仔细审读,它又像一本专题性、系统性的礼制研究论文集。说它像论文集,是因为它每一章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大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围绕解决这个大问题,又以节的形式带出若干小问题,在逐个解决这些小问题后,自然就升华出更高层次大问题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论》具有强烈的创新探索意识,因而许多问题的提出都是前人所未有注意到的,如强化认识以礼治国的意义、礼学的特点、五礼制度化的原因和意义、国家祭祀对象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尊老养老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作用、誓师之礼的精神因素、军法与军礼的关系、主宾之间的关系、不同政权交往之礼的特点、西晋、北魏实行三年之丧的意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使整个著作新意迭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仅以五礼制度的学术文化背景一章为例,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阐述了下列观点:

第一,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是具有持续性的,并呈日渐兴盛趋势。在这种发展趋势中,有影响的礼学家代有其人,有影响的礼学著作屡见不鲜,可以说,三礼之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热门显学(第67页)。

第二,三礼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不但是热门显学,而且在当时整体礼学发展中还处于核心地位。三礼之学的核心地位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三礼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构成了以《周礼》为经,《仪礼》、《礼记》为传的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一个是围绕着三礼整体,部分的、具体的礼学研究纷纷兴起(第67页)。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的官学中,国子学在提高整体儒学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子学、太学、州郡县乡等基层官学组成的官学体系,是礼学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官学、私学、家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传承三个重要的渠道,在这三个渠道中,官学起着主导作用。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官学体现着朝廷的意志,对全社会的重礼之风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第88页);朝廷及官学集中着大批优秀的礼学家(第91页);私学服务于官学,具体表现在向官学输送人才和弥补官学的不足(第93—95页)。

第四,礼学具有实用性,其表现在礼学是礼存在并显示其对社会重要作用的理论形式,它指导人们解决在礼制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它有助于提高个人及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第97—98页)。

上述观点是前人研究礼学时所未曾提出的。三礼学形成新的礼学体系及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发展,为五礼制度化的整个进程提供新鲜的学术理论支持;礼学对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指导,对士族及寒素在仕途上进取的推助,都是前人所未论及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关于官学在礼学传承中主导地位的观点。以往历来研究

者都把礼学传承的注意力集中在世家大族上，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官学衰败家学兴盛的时代，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官学。作者第一次对官学的作用及地位给以关注，指出礼学不是普通的学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制度存亡，百姓教化，民俗风情，因此备受国家重视，官学在礼学的发展中也就占到了主导位置。作者并没有抹煞私学的作用，同时指出官学的主导地位丝毫不能抹煞私学在礼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是官学的有力支撑和重要补充，没有私学的存在就没有官学的发展。官学、私学、家学三种途径互相依存，互相支撑，互相流动，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真实的。

在《考论》其他各章，也都各自围绕主题提出系列新鲜见解，可以说创新是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作者并非是为求新而求新，并非毫无根基地标新立异。首先，所有新鲜见解都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的。仍以五礼制度的学术文化背景为例，上述新鲜见解都是在除附录以外的前四节中提出来的，而这四节的文字据我统计竟有近五万字之多，在这么大的篇幅中，没有什么空话闲话，都是围绕着基本观点进行细致的分析论证，这并非仅仅是五礼制度的学术文化背景一章的特点，整个著作都是如此。其次，所有新鲜见解都是建立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例如军礼中对东晋讲武练兵的分析，作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东晋是西晋的继承者，从逻辑上讲，本应全面继承西晋的讲武练兵制度，并全面实现西晋统治者以《周礼》为指导建立军礼制度的理想追求。然而事实并未按照逻辑发展，东晋的讲武练兵只有两次。一次是元帝太兴四年，一次在成帝咸和年间。东晋并非太平盛世，终东晋一朝，内忧外患不断，所发生的战事比西晋要多，然而所进行的讲武练兵活动却比西晋少。接着作者揭示出，东晋并非讲武练兵活动少，而是朝廷讲武练兵活动少，这种活动转移到地方州镇那里去了，地方州镇武装力量的强大证明了这一点。州镇大族手握强兵，又不断招募扩大军队，招募来的新兵壮勇，必定要频繁加以训练。最典型的就是前述“北府兵”。这支军队在与苻坚的淝水之战中表现得训练有素，苻坚登城而望，见东晋军“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对苻融说“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这显然是严格训练的体现。这种分析和结论是符合当时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实际的。最后，所有新鲜见解都是建立在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的。《考论》在书后附了一篇《引用书目》，开列古籍书目80种，今人著作及论文41种，包括了有关正史、类书、政书、私人撰著、文集、佛教著作、儒家经典、笔记小说、诸子著作、小学训诂以及现代人的研究成果。上述三点，为《考论》所阐述新鲜见解之科学、可信、有说服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

宏观论证与微观分析有机结合，从而升华出符合历史真实的高见，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所应运用的论证方法和所应达到的学术境界。前者能够反映出作者的理论概括水平和史学见识，后者则反映出作者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考论》可以说是一部既有宏观论证又有微观分析的史学佳构。

总览《考论》全书，五礼制度的思想认识背景、五礼制度的学术文化背景、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原因及意义三章具有高屋建瓴、精彩的宏观分析，而后面五章对吉、嘉、军、宾、凶五礼的论述则偏重于具体的微观考辨。然而这只是从目录得出的直观总体印象，如果宏观论证和微观分析真是这样泾渭分明，就谈不上有机结合了。事实上《考论》一书宏观论证中有微观分析，微观分析之后有宏观的理论总结，二者紧密结合。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宏观论证的章节中有微观分析，以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原因及意义一章最为典型。作者把这个进程细分为五礼制度的孕育期（汉末三国）、发育期（两晋宋齐）、基本成熟期（梁天监、北魏太和以后），并对这三个阶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例如在分析孕育期的时候，作者首先分析了徐幹的《中论》、曹植悼念曹丕的诔文、博士马照与魏帝曹髦的对话、高堂隆的奏章、杜恕的《体论》等文献资料，指出人们对礼的功能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接着又深入考察了这个时期祭礼、军礼、丧礼、宾礼等发生的变化，最后指出，三国时人们对礼的认识发生变化，礼的内容也发生变化，但以冠、婚、丧、祭、乡、相见六礼为基本构架没有改变。《士礼》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推士礼以及天子”，以士礼为中心，而上述变化却要求从国家制度的高度去构建礼制。这种矛盾状况，实际上在酝酿着一场礼仪制度的变革（第135页）。像这种微观分析在发育期、基本成熟期都是如此，此不再赘。

在微观分析中抽象出宏观的理论概括，这种情况在《考论》中也屡屡出现。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在军礼与军法关系一节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述军礼的五项内容：大师之礼，即天子诸侯出兵征讨；大均之礼，即用军事力量使各诸侯国内赋税均平，以优抚民众；大田之礼，即指国家军队的军事训练；大役之礼，即使用民众力量进行国家的建筑工程；大封之礼，即必要时以武力勘定巩固境内各诸侯国的疆界，使其民安居合聚。五项内容中，出兵征讨、军事训练是军礼很好理解，然而均赋税、正疆界、兴工程与军礼相联系就令人费解。作者根据清人秦蕙田的解释，指出西周的制度是根据诸侯土地多少制定田赋，诸侯根据所收田赋多少而决定为天子出兵多少，在这种制度下，土地、田赋与军事是连在一起的，兵农的身份是合一的，他们平时为比闾、族党、州乡，战时则为伍两、卒旅、师军，农即是兵，官即是将，所以无论是战时的征伐，军事训练，还是兴建工程，开沟修路，都以严厉的军法制之，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之。作者又详细考察了《周礼》中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乡士、甸人、大司马、小子等官职的职掌，指出这些职掌反映了兵农合一、官将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种社会组织结构中，官吏用治兵的军法和纪律治民，所以会在军礼中出现大均、大役、大封等内容，这实际上是“先王以讲礼而寓御众之权”，所谓“御众之权”就是军法和军纪。也就是说，军礼的内容包括军法和军纪，反映了汉代对军礼和军法关系的认识。作者还对《汉书·艺文志》为什么把《司马法》列为礼类书籍进行考证和分析，指出班固把讲军事技术和技巧的书籍归入兵书类，把讲战略思想军法军纪的书籍归入礼书类，说明东汉时人们也认为军法是军礼的一部分。最后

作者又把《孔丛子》中的《问军礼》篇与《隋书·礼仪志》中的北齐天子亲征之礼进行比较,指出《隋书·礼仪志》所讲的天子亲征之礼与《孔丛子》在仪节程序上几乎是一样的。《孔丛子》编定于东汉后期,在汉末三国时始在经学家制礼作乐的社会实践中受到重视,北齐处于魏晋南北朝即将结束的时代,从汉末三国直到南北朝末期,军礼仪节的基本相同,说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五礼体系中,军法军纪是属于军礼的内容之一。通过这些细致的分析和考证,作者其实是在说明军礼与军法关系这样一个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这样论述道:“礼与法的关系是史学研究和法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军礼与军法的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所关注的礼与法是指儒家的礼义与国家刑法的关系,二者有一个从并列到交融到结合的发展过程。而军礼与军法的关系与前者既有联系也有不同,军礼与军法没有并列过,二者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不同之处。然而二者的关系状态受着礼与法关系发展进程的影响,这表明它们之间又有着某种联系。”(第481页)“在魏晋南北朝人们的观念中,礼的功能不仅仅是教化,因此礼的仪式性并非其唯一的特点。《司马法》这部强调依法治军的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礼类,在《隋书·经籍志》中也列为礼类,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被列为兵书类,这种归类的变化,大致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关于礼的观念的区别。”(第491页)

关于西晋北魏的三年之丧是从微观分析到宏观概括的精彩篇章。作者分别分析了西晋武帝和北魏孝文帝恢复三年之丧制度所遇到的阻力。西晋武帝恢复三年之丧,面临的是要改变曹魏已经确立的葬毕除服的天下成法,以及重要的朝廷大臣因担心影响兴化致治而坚持的反对态度。面对重重阻力,晋武帝恢复三年之丧的态度格外坚定,作者这样分析说:“五礼制度产生于魏晋之际,晋武帝恢复三年之丧制度正是在建立五礼制度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五礼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五礼之一的凶礼,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丧服制度,而三年之丧是整个丧服制度的重要基石和参照。从国家制度角度讲,国君不行三年丧礼而臣民百姓行之,不但有亏君臣之道三纲之常,而且依然是国家大礼和民间士礼互相脱节的两张皮局面,不符合五礼制度的原则。从伦理纲常角度讲,如果子不为父服三年斩衰之丧,那么,他为母服三年或一年的齐衰之丧也就失去了依据。同理,他与其他远近亲属的丧服关系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如同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坍塌,引起整个丧服体系的崩溃。晋武帝不顾众臣的反对,向汉魏丧服成制发起挑战,最根本的还是建设五礼制度的需要。”(第636—637页)

无独有偶,北魏孝文帝在实行三年之丧制度的时候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阻力。作者指出了三个困难和阻力:北魏拓跋族的丧葬传统,文明太皇太后“过葬即吉”的终制金册,一批旧贵族对新制度的极力反对。特别是旧贵族的反对,作者还仔细分析了旧贵族穆亮给孝文帝的奏章,奏章中提出三年之丧违背天意、违背先圣之意、违背太后终制金策、违背民意的“四违背”之论,简直就是代表拓跋旧贵族声讨三年之丧制度的檄文。作者对孝文帝之所以不顾巨大阻力坚决实行三年之丧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这是因为孝文帝所要创立的是一项重大制度,即五礼制度。孝文帝在实行三

年之丧制度时，其情形与西晋武帝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说明了二者都是处在五礼制度建立的重要关头，他们所实行的三年之丧制度对于理顺丧礼制度的关系，确立五礼制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第642页）。作者不是孤立地看待西晋武帝和北魏孝文帝实行三年之丧制度，而是找出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从具体事件中升华概括出五礼制度建立这样重的大问题，这确实是作者高屋建瓴地透视出晋武、魏孝文二帝坚决实行三年之丧皆为建立五礼制度关键之高见。

四

如前所述，《考论》像一本专题性、系统性的礼制研究论文集。这种体例固然有其长处，可以集中地论述问题，避免肤浅，但问题也是存在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从整体布局看疏密不均，主要表现在对五礼内容的论述上，吉礼、嘉礼、宾礼论述内容比较丰满，而军礼和凶礼则显得稍微单薄。军礼的出征命将、祭告宗庙等内容都没有论及。凶礼方面只涉及到了赙济、抚恤、吊唁，其他如殓殮、祭奠、葬仪等似未曾提到。内容丰富的丧服制度只提到了其核心内容三年之丧，其他少有涉及。

第二，有同一条史料重复使用的现象。除此之外，书中还存在个别的技术性的错误，如把唐长孺先生文章的名字《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写成《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第149页）。我想作为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家，作者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就没有写错（第356页），可见是电脑固定组词在作祟。然而这样细而专的错误指望编辑校对去纠正是不现实的，作者有责任去发现纠正。

最后要说的是，金无足赤，书无尽善，任何一部大型专著，要全部内容绝对完善无误，这是不可能的。对于提出的上述不足，我不想用“白璧微瑕”、“瑕不掩瑜”之类的套话总结，但却真心希望不会因此而影响对《考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断代礼制研究力作的基本评价。

（作者黎虎，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0年1月28日